



广西现代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

王 力 文 选 王 力 文 选 王 力 文 选 王 力 文 选 王 力 文 选 王 力 文 选 王 力 文 选

王 力  
西 欧 文 选

特别是高本汉和陈振寰西文选编

对于上古汉语阴声韵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力文选 / 陈振寰选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4

(广西现代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

ISBN 7-5633-3021-6

I. 王… II. 陈… III. ①王力-选集 ②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20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p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柳州市罗池路 13 号 邮政编码: 545001)

开本: 889 mm × 1194 mm 1/32

印张: 21.625 字数: 623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定价: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融通古今 博大精深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先生学术述评

陈振寰

20世纪就要向我们告别了。就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时期;科学的语言理论和历史比较方法被引进;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得到了初步的、科学的总结;对汉语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20世纪汉语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的开辟,都有赖于语言学大师们的引领;每一项重要成果的取得,都饱含着语言大师们的汗水。这些语言学大师,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既有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武装,又有对本民族语言实际的深入研究和透彻了解;既有朴学家求实的精神,不务凿空之谈,又有诗人的想像力,敢作清新之论。与20世纪同时诞生的王力先生,就站在语言大师队伍的前列。

1900年8月10日,王力先生诞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地处偏僻。父亲是个秀才,当过小学教师,这使子女从小

便能接受些诗礼教育；但王力尚在幼年，家道便已败落，上完高小就因贫辍学了。若在常人，或许就此沉沦下去，而王力先生却苦读不倦，自学了整整 10 年，读了 14 箱经史子集，打下了相当深厚的国学基础。这 10 年中，他办过私塾，教过家馆，当过小学教师。

1924 年秋，在亲友的资助下，先生远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南方大学和国民大学。两年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从此踏上了语言研究的大道。大师们博学明辨、务实创新的精神给了王力先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清华研究院一年的学习，可以说决定了他一生的治学之路。

在清华，在梁启超、赵元任的指导下，王先生完成了他语言研究的处女作《中国古语法》。

1927 年冬，在赵元任先生的鼓励下，王先生到法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除了直接受教于法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外，还深受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的影响。在法国，先生的主攻方向是实验语音学，1931 年以《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博士学位。

1932 年，先生回国，任教于清华、燕京两大学。直到先生辞世，54 年间，先生始终没有离开高教岗位，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执鞭。他的学术研究也始终跟教学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 54 年的学术活动中，先生撰写了 50 多种专著，20 多种译著，200 多篇论文，总字数约 1200 万字，平均每天完成定稿

六七百字，而且都是用毛笔，以蝇头小楷写就的——他的勤奋，他的专注，他的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是很少有人能比的。

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举凡语言学的各个门类如：音韵、训诂、词汇、语法、诗律都曾涉猎过，而且都有成系统的专著。先生之学，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精微兼而有之”（朱德熙《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不仅如此，他还是诗人（有《龙虫并雕斋诗集》）、散文家（有《龙虫并雕斋琐语》）、翻译家（有二十几部译著）、外国文学专家（有《希腊文学》、《罗马文学》）。这使我们想起先生对他的业师赵元任先生的一段赞辞：“赵先生 26 岁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1921 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来中国，他当翻译。此后，他到他的母校康纳尔大学当物理学讲师。1925 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教书，开始他教数学，后来才到清华研究院当教授，教语言学。他文学也不错，翻译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就更深了（按：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先生是谱曲者）。1981 年他回国，音乐界人士专门开会欢迎他。赵先生是由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做底子，最后才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的。”（《我的治学经验》）先生不也是如此的通才吗！大师们的天地都是非常广袤的，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

—

汉语语音—音韵研究是王力先生语言研究的一个重心，在这方面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

先生赴法留学即主攻实验语音学，博士论文为《博白方音

实验录》；归国后在清华、燕京两校最先讲授的课程是《中国音韵学概论》；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专著是《中国音韵学》（1935年。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语言学著作是《汉语语音史》（1985年5月），最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是《京剧唱腔中的字调》（1986年）。可以说，语音—音韵研究贯穿于先生学术生命的始终。

《中国音韵学》（以下简称《音韵学》）是我国第一部拨开传统音韵学的迷雾，用现代语音学原理全面地、系统地整理、介绍汉语音韵知识的教科书式的学术专著。作为启蒙读物，它培养了几代音韵学者，在传统音韵学转变为现代音韵学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和特色，语言学大师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说得十分清楚。罗先生称赞这部书“首以玄虚之谈为戒”，用科学的语音知识“给读者打好了审音的基础”，再以科学理论爬梳、诠释传统音韵学术语，“为初学者开示门径”；此书“《本论》，先把《广韵》讲明白，然后再根据它来上考古音，下推今音，对于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能够纵横兼顾”；是一部“能蒐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容易理解”的“深入浅出”的“好著作”。李先生赞赏它是一部“合乎近代语言学原理，使初学的人，可以得到一个正确概念的”“不可多得”的好书；说它“不仅仅乎是作入门之用”，“他不但把汉语几个重要时期的音韵的大概情形何如，有什么材料可用，有什么方法可以整理这些材料，声韵变化的情形何如，等等，告诉我们。他还引了古今中外的学者的学说作为参考资料。一方面是便利初学参考用的，另一方面就是把汉语音韵学的略史写出来”。也就是说，李先生认为它是一本兼有入门教材、音韵简史和音韵学略史作用的著

作。

在《音韵学》出版的同时和稍后,先生还发表了重要论文《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以下简称《用韵考》)、《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以下简称《异同考》)、《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以下简称《系统》)等。其后直到50年代,先生把主要的注意力投向了汉语语法(其间也发表过重要的音韵史论文《汉越语研究》)。

50年代后期,随着《汉语史稿》(1957。以下简称《史稿》)的出版,先生的音韵研究又出现一个高潮,先后出版了《汉语音韵》(1963),发表了《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以下简称《分野》)、《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1963。以下简称《五部》)、《先秦古韵拟测问题》(1964。以下简称《拟测》)等重要论著。

“文革”期间,即使处在被审查、批斗的情况下,先生也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音韵学、音韵史以及音韵与词汇相结合的研究。因此,“文革”甫一结束,先生的论著就接连发表,其中重要的音韵学论著有《楚辞韵读》(1980)、《诗经韵读》(1980)、《汉语语音史》(1985)、《黄侃古音学述评》(1978。以下简称《述评》)、《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1980)、《古无去声例证》(1980)、《朱熹反切考》(1982)、《经典释文反切考》(1984)等。

先生音韵研究的贡献,在上古音研究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 (一) 脂微分部

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分类,二是拟音。科学的古韵分类研究是从清初顾炎武开始的。顾炎武受到明末陈第语音发展观的启发,最先打破中古韵书韵部的界限(所谓“离析唐韵”),客观地归纳先秦韵文韵字(以《诗经》为基础),分古韵为十部。其后,江永分为十三部,戴震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朱骏声各分为十八部,严可均分为阴阳各八部,王念孙、江有诰各分为二十一部,夏忻分为二十二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后出转精,分部的基本原则则是一致的:客观地串连韵字,同时参以音理,将虽与它部有合韵通押现象,但主体仍能独立的韵部析分出来。王先生曾著《异同考》据谐声偏旁分析《诗经》入韵字为三十二类,以此三十二类的分别归并,考察诸家分部异同,一目了然。先生科学地将顾氏以降的古音学家分为考古、审音两派,说:“顾、段、孔、王、严、朱、章为一派,纯以先秦古籍为依归”,称考古派;“江永、戴、黄为一派,皆以等韵条理助成其说”,称审音派。“江有诰则折中于二派者也。”《系统》一文,则将江有诰归入考古派,并进一步补充说:“所谓考古派,并非完全不知道审音;尤其是江有诰与章炳麟,他们的审音能力并不弱。不过,他们着重在对上古史料作客观的归纳,音理仅仅是帮助他们作解释的。所谓审音派,也并非不知道考古;不过,他们以等韵为出发点,往往靠等韵的理论来证明古音。”“审音派的最大特色就是入声完全独立,换句话说,就是阴阳入三分。”再换句话说,考古派入声是不完全独立的,所以他们的古韵分类一般比审音派要少一些。王先生早年是倾向于考古派的,晚年则转向审音派。



《系统》一文是古韵研究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脂微分部。

古韵分类到了章炳麟的二十三部已经极为严密,很难再加以析分了。他的弟子黄侃虽然分出了二十八部,实质上只是接受了戴震入声独立的学说,把章氏合到阴声里的人声韵部独立出来而已。

章氏的二十三部建立在王念孙二十一部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孔广森的意见,把东部分为东、冬两部(王力先生主张冬部归侵,章氏晚年亦主此说),成为二十二部;章氏最大的特点是把王念孙的脂部又分为脂、队两部。他发现脂部中的中古去、入声字在《诗经》中往往单独押韵,于是把这部分字划出,再加上和它们相应的平上声字,独立为队部,成为二十三部。

王力先生在考察南北朝诗人用韵时,已然发现“《切韵》的脂韵舌齿音合口呼在南北朝该归微韵”,再受到章氏把王氏脂部一部分平上声字划出来归入队部的启发(这部分字黄侃又归回脂部),便考虑应该把王念孙的脂部分为脂、微两部<sup>①</sup>。分部的标准大体是:《广韵》齐韵字和脂韵皆韵开口字属脂部,微、灰、哈韵字和脂韵皆韵合口字属微部。他仔细分析了《诗经》中押脂微部韵字的110个韵例,发现两部分用的有84例,占76%,两部合用的仅26例,不及24%;尤其是较长的篇章如《大雅·板》第五章八韵,《小雅·大东》第一章六韵,《周颂·载芟》五韵……全用脂部,不杂微部一字;《齐风·南山》五韵,《大雅·云汉》六韵……全用微部,不杂脂部一字。这只能说明两

<sup>①</sup> 王先生在《系统》中论脂微分部的标准时,说的是把江有诰的脂部两分,那是因为王念孙已经把江氏后来归入脂部的一部分去入声字划为至部,即王先生二十九部中的人声质部,而王先生早年是不主张入声独立的,所以脂微部分分江而不分王。

部分立是本质现象,杂用是韵近通押。于是脂、微分部说便建立起来了。

此说一出,立即得到音韵学界的重视。后来,王先生入室弟子董同和又据谐声材料进一步论证,认定“脂微分部说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上古音韵表稿》)脂微分立遂成为不刊之论。章氏总结清儒古韵分部后至今,音韵学者虽然也还提出过一些补充或修改的意见,但能够得到一致认同的,只有先生的脂微分部一说。

## (二)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的古韵系统

在《系统》一文中,王先生分划古韵为十一系二十三部:之蒸、幽、宵、侯东、鱼阳、歌曷寒、支耕、脂质真、微术淳、侵缉、谈盍。同时还分别开合、洪细,配合声母(“暂时略依陈澧所分《切韵》四十声类,复从黄侃把明微分立”)纳入《诗经》全部入韵字,列成了系统、完整的上古音节表,提出了“凡同系者其主要元音即相同”的观点。这是一个十分严整的古音系统。关于声母,先生后来主张六类三十二母。上古声母的确认,问题比较复杂,意见分歧较多,暂不讨论。关于韵部,则可以肯定地认为这已经是当时古音系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20年后,先生在《史稿》上册中,将原来分别归入相应阴声的人声六部(“之”之入“德”——改称“职”,“幽”之入“觉”,“宵”之入“沃”——改称“药”,“侯”之入“屋”,“鱼”之入“铎”,“支”之入“锡”)独立,形成一个十一类二十九部阴、阳、入三声严格对应的古韵系统:

阴声韵:之幽宵侯鱼支脂微歌△△

入声韵:职觉药屋铎锡质物月缉菓

阳声韵:蒸△△东阳耕真文寒侵谈

先生在《分野》中说明了他之所以从早年二十三部发展为晚年二十九部的道理:“20年前,我对于上古汉语的韵母主张二十三部的说法,那就是大致依照章炳麟的二十三部,从他的脂部分出一个微部,再合并他晚年所主张合并的冬侵两部。前年我讲授汉语史,在拟测古韵母音值的时候遭到了困难。我不愿意把之幽宵侯鱼支等部一律拟成闭口音节,否则是违反中国传统音韵学,而且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又不能像章炳麟想得那样简单,一律拟成开口音节;假使上古的药觉职德沃屋烛铎陌锡诸韵不收-k尾,它们在中古的-k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讲语音发展不能不讲分化条件,否则就违反了历史语言学的根本原则。在这时候我才觉悟到戴震阴阳入三分的学说的合理,于是我采取了戴震和黄侃的学说的合理部分,定为十一类二十九部,比黄侃多了一个微部和一个觉部,少了一个冬部(并入于侵)。这样,入声韵的职觉药屋铎锡收音于-k,和开口音节的阴声韵并行不悖,各得其所,而分化条件也非常明显了。”

十一类二十九部的系统准确地显示了古汉语韵类的完整格局,阴阳入三类韵分划整齐而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既符合《诗经》用韵分合远近的实际,符合语音变迁中阴阳入声对转的实际,又能很好地呼应中古音系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音韵学界最为广泛的认同,成为迄今最有影响的、为最多的文史工

作者采用的古韵系统<sup>①</sup>。

### (三)上古音值的科学构拟

自从高本汉把印欧比较语言学构拟古代语言形式的方法运用到上古汉语音系音值的拟测以后,中国的音韵学家都很重视古音构拟工作,而且大都离不开高本汉拟音的模式或影响。<sup>②</sup>

王力先生早年研究古音时,注意力主要放在科学地划分韵部上,拟音则采用了高本汉的系统,但是他已经看到高氏拟音存在着许多问题。他在《音韵学》中指出:“其所定的音值,则有待于修正者甚多。高氏似乎以为在《切韵》不同音的字在上古亦必不同音,这一点未免太呆板。”经过了20年的深入研究,50年代中期,先生在批判了高本汉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切合古汉语实际的完整的上古音音值体系。这个体系首先刊布于《史稿》(1957年),又在《分野》(1960年)、《五部》(1963年)、《拟测》(1964年)等文章中作了深入的理论阐述。先生在古音音值拟测上最有创见的地方是:

#### 1. 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

先生否定了高氏把上古的韵部等同于中古的韵摄,同一韵部可以包括几个主要元音(例如之部包括ə、ε、u三种主要

① 在《古代汉语》中,把先秦古韵分为三十部,多了一个跟幽、觉对应的冬部。这是为了更加适应包括《楚辞》在内的先秦诗文押韵的情况:“《诗经》的押韵,除冬部应归侵部外,情况基本与这三十部相合。”“《楚辞》的用韵和《诗经》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冬部已经从侵部分化出来。”

② 西方学者构拟上古汉语音值影响较大的除高本汉以外还有西门华德(Walter Simon),他把古阴声韵尾拟为-β、-δ、-γ,入声韵尾拟为-b、-d、-g。

元音)的做法,认为上古韵部是韵文谐押的韵类,每一个韵部主要元音必定是相同的。他说:“高本汉把上古韵部看做和中古韵摄相似的东西,那也是不合理的。例如《诗经·关雎》以‘采’‘友’为韵,高本汉把它们拟成 *ts'æg, giüŋ*, 我们古代的诗人们用韵会不会这样不和谐呢?《邶风·击鼓》以‘手’‘老’为韵,高本汉把它们拟成 *ciog, lôg*, 为什么‘友’字不能和读音较近的‘手’字押韵,反而经常和读音较远的‘采’字等押韵呢?应该肯定:《诗经》的用韵是十分和谐的,因此,它的韵脚是严格的,决不是高本汉所拟测的那样。”(《史稿》)

为了解决上古音向中古音发展的条件问题,先生认为上古韵部内部有开合洪细之分。他说:“从系统上说,上古的等呼和中古的等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部不同等,只是韵头的差异”;开口一等无韵头,二等韵头 *e*, 三等 *i*, 四等 *y*; 合口一等韵头 *u*, 二等 *o*, 三等 *iu*, 四等 *yu*。(《诗经韵读》)

先生这样每部一个主要元音,内部再分等呼的构拟体系,既使上古韵系条理明晰,更符合上古诗文用韵的实际,又能很好地解释语音的发展,自然会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 2. 阴声收元音,阳声收鼻音,入声收清塞音。

先生批评高本汉“拘泥于谐声偏旁相通的痕迹”,于是把之幽宵支四部的全部和鱼部的一半都拟成人声韵(收-*g*),又把脂微两部 and 歌部的部分拟为收-*r*的韵,于是只剩下侯部和鱼歌两部的一部分是以元音收尾的韵,即所谓“开音节”,是“形式主义”的做法,他指出: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开音节是像这样贫乏的”,而“开口音节对闭口音节的优越性,这是汉藏语言的共同特点”。②“在汉藏语系中,韵尾-*g, -d, -b*和-*k, -t, -p*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③“阴阳入三分的传统学说

必须维持”，“因为它是符合汉语特点和汉语发展的实际的”。“从整个语音系统来看，上古汉语的阴阳入三声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同时又是互相区别的。”

根据这样正确的认识，先生构拟了阴阳入三分，阴声以元音收尾(包括无尾)，阳声以鼻音(-m、-n、-ŋ)收尾，入声以清塞音(-p、-t、-k)收尾的严整的上古音值体系。

#### (四)构建了“平入两类，各有舒促”的上古声调系统

上古汉语有无声调？如果有，分为几类？这是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拿清儒的意见说，顾炎武虽未否认四声的存在，但主张上古“四声一贯”；段玉裁主张“古无去声”，下余三声；孔广森主张古无入声，也余三声；黄侃认为上古只有平入两声，而由于入声主要表现为韵尾塞音，实际等于没有声调；现在更有人认为前上古本无声调，声调是不同韵尾演化的结果。

早在《系统》中，先生就提出了“阴声有两个声调，即后世的平上，入声也有两个声调，即后世的去入”的看法，但未及详论。1957年在《史稿》中，先生正式提出两类四声的上古声调系统论，他说：“先秦声调除了以特定的音高为其特征外，分为舒促两大类，但又细分为长短。舒而长的声调就是平声，舒而短的声调就是上声。促声不论长短，我们一律称为入声。促而长的声调就是长入，促而短的声调就是短入。”他又从声调的发展上阐释道：“上古的长入，由于它们的元音都是长元音(类似现代广州话的中入)，在发展过程中，韵尾-t、-k逐渐消失了。”后来，在《汉语语音史》中，他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上

古四声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音量)的分别。必须是有音高的分别的,否则后代声调以音高为主要特征无从而来;又必须是有音长的区别的,因为长入声的字正是由于读音较长,然后把韵尾塞音丢失,变为第三种舒声(去声)了。”这就从语音发展规律上把划分调类的依据说明白了,而且,不但划分了调类,实际上也构拟了调值(高长舒、低短舒、高长促、低短促)。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于上古声调系统最好的设计。

除了上述四点,先生关于上古音还有一些重要而精彩的意见,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下面只举先生对谐声性质的看法为例。谐声是研究上古音系的重要材料。段玉裁提出“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同声必同部”的著名论断,既对上古音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也因对谐声能否正确认识和运用而出现许多纠缠盘绕、使人困惑的问题。王力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如何正确地、辩证地认识谐声性质的问题。他在《系统》中指出:谐声对于古韵分部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在《诗经》时代“不免有些出入”,而且“声符的认定,有时还成为问题”,故而必须参照音理,正确对待。后来,先生又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谈到这个问题。他批评高本汉把上古阴声韵拟测为浊塞音韵尾正是“拘泥于谐声偏旁相通的痕迹”,而未能以音理权衡,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史稿》)他指出:“‘同谐声者必同部’这一原则也不能机械地拘守。先秦韵文(特别是《诗经》)和声符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以韵文为标准,不应该以声符为标准,因为造字的时代比《诗经》时代至少要早一千年,语音不可能没有变化。在这个问题上,不但段玉裁失之拘泥,后代许多著名的音韵学家也都想不通。如果想通了,就

免去了许多葛藤。”(《分野》)先生这里还只强调造字时代到《诗经》时代语音不可能没有发展,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其实,即使造字之初,声符字与被谐字的语音关系也是复杂的,同声符者未必声韵相同。如果更推衍段说,认定“‘凡同声符者必同声母’那就荒谬了”;“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语音史》)正因如此,先生对于主要根据谐声系统而提出的上古有复辅音声母说,始终采取慎重存疑的态度。

在中古音研究中,先生亦多有贡献,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指示了一条路径:通过归纳研究断代韵文和音释材料等来探求当时语音系统的真实面目。

向来研究中古音系主要依据是《切韵》(《广韵》),而以早期韵图为参证。因此,对《切韵》和早期韵图性质的认定就成为建立中古音系的出发点。对于《切韵》性质的认识,大体分为两派、三种意见:一派认为切韵是一种纸上的音系,它兼容古今方国之音,是综合音系,章炳麟是这派的代表。另一派认为切韵是一种实存的音系,此说始于陈澧。后来又派生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切韵》就是6世纪的长安方音(高本汉),一种认为是六七世纪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读书音。王先生是赞成综合音系说的,他说:“切韵的系统并不能代表当时(隋代)的首都(长安)的实际语音,它只代表一种被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这种语音系统纯然是属于书面语言的。”(《史稿》)“陆法言自己声称,他的切韵是‘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写成的,当然不是一时一地之音。”(《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讨论两派意见谁是谁非,我们想提出的是:无论你主张综合音系说还是单一音系说,你能不能从理论阐释



到音值构拟都自圆其说,合情合理?王力先生对自己的主张是能够据理立论并为作为综合音系的切韵系统构拟出合理的音值体系的(见《史稿》第二章第十节)。他解释说:“因为切韵系统既然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那么,上面所列的61个韵类和92个韵母就不能理解为同时存在的。例如支脂之三韵之所以分别拟成 $\text{ʔe}$ , $\text{i}$ , $\text{ʔə}$ ,是因为从历史来源说它们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也许还在方言里留下痕迹,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长安话里能区别这三个韵。”近现代学者中真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构拟出如王力先生那样合理的体系的,我认为是不多见的。

先生并未就此停步。虽然“承认206韵的系统是有好处的,因为由此可以上推古音,下推现代方言”(《史稿》),但是为了研究语音发展历史,必须尽可能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语音实貌,特别是切韵时代的语音实貌,弄清切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兼容着古今南北之音。这就必须走另一条途径,像清代古音学家从先秦韵文归纳上古音系一样,从经过严格核校的共时共域的韵文材料和足以反映时音的音释或其他材料中分析归纳出当时的语音系统。这正如王力先生1936年在《用韵考》“导言”中所说的:“如果我们要求一部语音实录的话,吕静诸人的韵书价值未必不在《切韵》之上,而它们的丧佚也就是音韵学上的损失。但是,我们还有别的史料,藉此可以审核《切韵》的归类是否符合当时的语音系统。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南北朝的韵文,因为这是与韵书有直接关系的;纵使《切韵》与《广韵》也都丧失了,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史料编成一部韵书。”近一二十年,考察历代韵文以探求当时音系的论著越来越多了,成绩也很明显,但必须承认,《用韵考》是最早以汉魏